

母职的悖论：从女性主义批判到中国式母职策略

吴小英

摘要：过去几十年中母职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一个流行议题。从西方女性主义的演变脉络来看，母职研究经历了从母职到母职实践、从批判到重塑的过程，其概念本身也可分解为作为制度、经验和认同的母职这三个彼此关联的维度。有关压迫还是赋权的争议构成了经典的母职悖论，也体现了母职经验的多样性和变动性。受女性主义影响，国内母职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完美母亲的话语批判和对城市中产阶级女性的母职困境分析方面。与此同时，基于性别、代际、阶层等不同视角的母职经验分享也呈现出许多中国独有的议题、困惑以及实践策略。但母职的悖论在国内学界并不以政治议题出现，而是呈现为家庭还是个体优先、孩子为中心还是女性自我追求为中心的两难选择。这种放置在私人框架下的母职讨论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只有让母职走出私人化议题，回归公共性，才是挣脱悖论的核心要义。为此国内母职研究尚有一些未解之题有待进一步挖掘。

关键词：母职；母职实践；女性主义；悖论

DOI: 10.13277/j.cnki.jcwu.2021.02.004

收稿日期：2021-02-06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21)02-0030-11

作者简介：吴小英，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社会学、性别研究。100732

近十年来，“母职”(motherhood)一词在国内媒体和互联网中成为与家庭和女性主题相关联的重要热词，动辄进入“10万+"的流行网文行列。与此同时，学界相关研究和讨论的热度也不断上升，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一经由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女性主义的挖掘而广受关注的概念和主题，曾经作为反映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女性境遇、并对经典的“男性挣面包模式”发起挑战的重要起点。一个以对现代主流核心家庭和女性角色规范的批判为主调的西方概念和理论，何以会在30多年后的中国城市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引起共鸣或争论？这是否意味着市场化转型之后城市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独生子女一代家庭和性别模式的变化，并未使得大多数中国女性走出家庭和母亲角色的困扰？如今她们需要重新面对和讨论这一代代相传的古老议题

以及不同以往的新境遇，而源自西方女性主义的母职概念及其相关研究为此提供了独特的思想和理论资源，但是否足以破解萦绕当代母职挥之不去的悖论？本文尝试在对女性主义的母职研究及其演变脉络进行简要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相关研究和热点问题，探讨母职的悖论以及中国式的母职实践策略。

一、从母职到母职实践：女性主义的母职研究及其演变脉络

母职研究(motherhood studies)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女性主义第二波，是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早期的一个经典议题，如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1968)、阿德里安·里奇的《女人所生：作为经验和制度的母职》(1976)、南希·

乔多罗的《母职的再生产:精神分析与性别社会学》(1978)等都属于这一主题相关的经典著作。不过,“母职研究”这一术语作为正式研究领域是由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母职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Mothering,简称ARM)的创建者安德里亚·欧莱利(Andrea O'Reilly)在1997年才提出来的,标志着母职研究作为一个合法而独立的学科的重要转变。该学会同时还拥有一年两期的专刊《母职研究学会专刊》(Journal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Mothering),以及仅以母职为主题的每年一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1] 831}

与此相应的还有政治意义上的母职运动(motherhood movement),主要诞生于20世纪晚期,强调母亲的赋权以及母亲和孩子利益的优先性,同时既反对那种把作为制度性的母职视为女性认同核心的观点,又反抗母亲分娩的医疗化,并试图通过寻求政治上的努力来改善母亲的生育与就业处境,提升母亲这个群体的形象,满足她们的社会需求。美国的母职研究学会本身就体现了女性主义这种行动和研究相结合的特点。进入21世纪以来,母职运动由于其越来越复杂而广泛的利益诉求而难以界定,但整体上依旧是繁荣的。从互联网和媒体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如今的母职运动焦点集中在女性为将母职和事业相结合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上。母职研究和运动推动了这样一种理念,即一方面女性有权以个体身份在母亲角色之外进入职场,另一方面母亲和母职在全社会应该得到更大的尊重。^{[1] 821-824}

(一)母职的界定:制度、经验与认同

然而对母职的概念加以定义或阐释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原因有两点:一是女性主义内部的不同流派和学者之间对于母职有着各不相同甚至彼此矛盾的解读;二是从母职研究的历史脉络来看,随着研究议题和重点的转移,对母职概念本身的理解和评判也发生了不知不觉的改变。这些变化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两条:从母职(motherhood)到母职实践(mothering),从批判到重塑。

母职相对应的英文词有两个,一个是motherhood,指的是社会文化中关于女性天然具有母性、因而顺理成章需要当母亲以及关于如何当母亲的规定,因此也有学者把它翻译为“母亲角色”或者“母性”;另一个是mothering,指的是现实中的女性成为母亲或者做母亲的过程和经验,重在母亲角色的主体感受和实践分享,也被翻译为“母职”“做母

亲”“养育”“母职实践”等等。^{[2]3-39 [3]345-370}在英文文献中,这两个词在很多场合是混用或者并列相加使用的,以强调母职研究涵盖了静态与动态、规范与实践、文化与个体等不同层面的全方位视角。但是也有学者将二者进行了明确区分,例如在欧莱利主编的《母职百科全书》(2010)中,专门有个词条讨论了mothering和motherhood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复杂而显著的关联,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1] 839-840}

这种区别可以追溯到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在20世纪70年代首版的那本成名作中的阐述。在那本书中,作者区分了母职彼此交叠的两种含义,即作为经验(experience)的母职和作为制度(institution)的母职,其中前者指的是“任何女性与她的生育力量和孩子之间的潜在关系”;后者指的是“旨在确保这一潜在力量和所有女性处在男性的控制之下”的制度,这一制度已成为最大多数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基石,它孤立并贬低了女性的潜在可能性。^{[4]13}可以看出这两种母职的含义有相互关联和重叠的一面,也有相互分离甚至对立的一面。里奇认为,作为制度的母职与父权制紧密相关,是由主流男性定义、社会和历史建构的对母亲角色的期待和要求;而作为经验的母职,则是女性独有的和个人的体验,但是也会受到制度性母职的社会期待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母职就是灌输了有关母职实践的职责、责任和标准的信念和价值观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它对于女性来说是极其压迫性的。^{[1] 839}里奇这一关于母职作为父权制的社会制度的分析已经成为女性主义母职理论的核心支撑点,其中关于两种母职的区分也成为至今影响女性主义母职研究的基本框架。

因此母职研究在女性主义那里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作为制度的母职的批判,探讨父权制社会的母职是如何建构而成的,质疑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关于女人的天性和女性气质适合在家当母亲、因而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母职对女性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假设。有学者指出,母职不仅仅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种由习俗、传统、信仰、态度、道德、法律、观念等强有力的符号要件所组成的关于生育和养育孩子的社会制度。^[5]也有学者明确地将母职划分为生物性母职(biological motherhood)和社会性母职(social motherhood),指出二者之间

并不一定等同。一个人想要成为社会性母亲并非一定要先成为生物性母亲,对女性来说成为母亲并不是一种天然需要,而是长期社会化的结果,不存在所谓“母性的本能”(maternal instinct)这类东西,跟性别一样,母职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成的。^{[6] 80-82}因此女性的生活不应该被限制在生育和照料孩子上,她们应该自由地选择不生孩子,可以安全地避免孕和堕胎;或者一旦生了孩子,她们也应该能够继续其他工作而不用中断职业。^{[7]191-214}这些质疑跟女性主义对家庭内部性别分工的批评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女性主义父权制批判的一个重要部分。与此同时,女性主义还挑战了主流文化中关于女性身体和欲望的规训,以及女性在生育过程中以男性为主导和权威的医疗技术和话语体系的霸权。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倡导女性应该夺回对自己的身体和生育的控制权(包括堕胎权),将生不生孩子、何时何地生孩子,以及如何生养孩子的选择权交还给女性自身。^{[1]395-396 [8]416-434}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母职研究包含着明显的转向,即从对制度性母职的批判转向对经验性母职实践的探讨,从来自不同阶层、种族和情境的女性的个体化和多样化的母职经验叙述和分享中,探讨母职赋权和女性解放的潜在可能。因为女性主义学者认识到,即便他们坚持女性有权选择不做母亲,或者选择做母亲的同时可以做别的工作,依然有许多女性包括女性主义者想要生孩子并体验做母亲那种丰富而复杂的滋味。因此女性同样有权做母亲,母职实践尽管可能是冲突性的或者压迫性的,但也可能在某些女性的生活中是核心的和心满意足的,而这样一种内在的张力和矛盾恰恰是在第一阶段的母职研究中所忽略的。^{[7]191-214}不过女性主义也发现,母职实践几乎不可能外在于制度本身,而总是以某些方式被制度所影响或形塑,因为在所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存在着虚假的界限,母职这一看起来纯属于家庭私人领域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受到诸如医疗、教育、法律、政府、媒体等各种公共体系和力量的影响。因此在聚焦母职制度如何通过意识形态得以运行和维系的同时,后续研究的关注点更多转向母职如何通过公共体系及其政策路径得以实施或强化,以及母职如何通过经验、认同和能动性等方式运行和表征出来,尤其是社会变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何永久地改变了母职对于女性、孩子和社会的意义和经验。^{[1] 831-832}

因此女性主义第二阶段的工作转向了探讨作为经验的母职和作为制度的母职之间的张力,并在里奇的两种含义之外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即女性对于母职的自我认同和主体性的认知,从而将母职研究分解为相互关联的三个范畴之间的探讨:作为制度或意识形态的母职、作为经验或角色的母职,以及作为认同或主体性的母职。^{[1] 403}

女性主义从两个方面考察了母职实践与认同或主体性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母职实践如何影响了母亲的自我认同。黑人女性主义者帕特里夏·柯林斯(Patricia Collins)在对非裔黑人女性的母职研究中发现,其生物性母职与母职实践之间的边界是流动的,因为黑人家庭的妻子需要跟丈夫一样外出工作,他们的孩子常常会托付给亲属网络或者社区的其他母亲来负责照料,因此这里的母职实践并不是由生物性母亲或者血缘母亲来承担,而是由所谓“他人母亲”(other-mothers)来完成的,因此对她们来说与社区共享母职才是黑人母职认同的核心。其次,女性主义发现母职实践也会影响到孩子的认同。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的研究探讨了以女性作为家庭的主要养育者和照料者对于男孩和女孩成长心理带来的不同影响,女孩们因为认同并模仿自己的母亲,将母女之间的互相依赖视为最重要的东西,从而延伸到女性未来成年后的母职实践,完成母职的延续和再造;而男孩们则认同与母亲的疏离才是最重要的部分,进而形成未来与他人之间更广泛意义上的分离和独立的品性。当然,这种解释也被视为更多基于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经验,因而无法用来解释劳工阶层或者有色人种家庭基于儿童的社区养育模式所呈现出来的男女认同差异。^{[1] 405-406}

从以上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女性主义关于母职的界定走过了一个从制度性母职到经验性母职实践的过程,这一转向最重要的特点是界定主体的变化:究竟是父权制意识形态建构的母职,还是女性自身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体验的母职,抑或是女性自我认同形塑的母职想象,前后最大的差别在于这种母职是以主流社会以及家庭规范的要求为中心,还是以女性自身的主体性需求为中心,这也使得母职研究相应地呈现出从早期对母职迷思的负面批判为主,到后来对母职实践赋权的正面肯定甚至颂扬为主的转变路径。^{[3] 345-370}然而这种转向并不能逃脱围绕母职本身的一个经典悖论,即女性选择作为

母亲与作为独立的人之间的两难,有女性主义者把它归纳为“母职的两难”(maternal dilemma),这不仅仅是指女性所承担的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问题,更在于女性如何在社会所期待的母职和作为个体的自我实现之间达成自由选择的问题。^{[9]1-2}

(二)母职的悖论:压迫还是赋权的争议

女性主义的母职研究并非简单地单线条进行,事实上批判和重塑这两条线一直并肩而立或者交叉而动。原因就在于作为母职研究的基本框架。里奇的两种母职之说从一开始就内含着某种张力,也就是说,母职实践本身既可以是压迫性的,也可以是解放性的,而女性主义的努力就是试图通过批判和反抗动摇前者,同时通过赋权来拯救和支持后者。这一过程被欧莱利称之为“通过母职实践来反抗母职”(mothering against motherhood),是女性主义母职研究和母职运动的重要策略之一。它强调母亲的自主性,旨在让女性在母职之外能够获得和保持自我。通过坚持以母亲为中心,而不是大部分传统养育观中所要求的以孩子为中心,女性主义以这样一种母职实践来反抗父权制意识形态下的母职所推崇的那些对于母亲来说无法企及的、理想化的种种规则和期许;同时通过在外工作并可能将个体的兴趣、职业等等放在孩子和家庭的需求前面,也挑战和质疑了主流的制度化母职安在母亲头上的约束和压制,而不是把它作为标准的、天然的、本能的东西而盲目接受。^{[1]401}

然而正是这种内在张力将母职的悖论展露无遗,也使得女性主义的母职研究陷入压迫还是赋权的争议中,双方的观点分歧在女性主义的不同流派中被进一步放大。其中之一来自阶级、种族和族群的多样性带来的不同母职经验,例如主流的母职研究主要基于白人中产阶级和上层女性的经验,对她们来说家庭和母职是女性受压迫的源泉;而对于下层的劳工阶级、有色人种以及少数族裔女性来说,家庭和母职却常被视为用来对抗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压迫的庇护场所。而且不同于主流核心家庭,黑人家庭的孩子抚养主要是通过亲属网络和社区中的“他人母亲”来共同完成。这种有组织的、富于弹性的、以女性为中心的流动母职网络,被女性主义视为一种用来应对种族、性别、阶级、族群等交叉性压迫的更具能动性的力量,它代表着参与社区服务工作的黑人女性的权力象征。然而即便如此,柯林斯依然认为黑人母职制度归根到底还是矛盾性

的,一方面母职被认为是值得尊重和有价值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付出了极高的个人代价。^{[10]173-199}也有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张力在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中也同样存在。母亲的养育行为一方面受到男性中心社会的影响和形塑,另一方面她们又被要求为自己的养育结果全权负责,由此形成了一种“全能母亲”(all-powerful mother)的信念。这就引发一种反复无常的矛盾趋势:一方面责备母亲是孩子一切问题的源头,另一方面又寄予一种理想化的完美母亲的幻象。^{[7]191-214}

关于母职的主要争议还来自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和文化女性主义(cultural feminism)的不同立场。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将母职与父权制绑在一起,如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核心就在于她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母职,两性在生育角色上的这种差异必然导致家庭和社会中劳动分工和权力的根本分化,只有通过采用替代性的生育技术将女性从这种压迫性的生物命运中解救出来,才能消除性别角色差异,最终形成一个雌雄同体的平权社会。^{[8] 416-434}安·欧克利(Ann Oakley)则将生物性母职视为建立在三重虚假信念基础上的神话,即“所有女性都需要成为母亲,所有母亲都需要她们的孩子,所有孩子都需要他们的母亲”。^{[11]186}她认为这些假设都是不成立的,母职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建构,一种以压迫为目的的神话。如果不会被指责为自私或者不正常,很多女性可能更愿意不要孩子而不是勉强成为母亲,或者更愿意跟别人一起来分担抚养孩子的责任,而不是将母职作为一天24小时专注的工作。欧克利针对20世纪英国家庭主妇的研究发现,很多主妇都很不开心,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很不满意,而更糟糕的是,对于女性来说,承认自己对做母亲的不满,就相当于承认她作为一个人的失败。^{[6] 82}

另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则认为,母职跟父权制是可以分离的,从自己的身体出发来创造生活的能力是女性力量的来源。放弃这样一种能力,就相当于让女性放弃了父权制下唯一的权力,这样一种让渡会让男性的权力强大得无以复加。因此要想终结女性的受压迫状况,不是放弃母职,而是要为女性开拓母职中的力量。里奇指出,男性通过父权制的异性恋婚姻和母职制度控制女性的生育权力,同时还试图通过分娩的医疗化以及在如何“正确地”养育孩子方面充当权威来控制孩子在生养问题上的

话语权,正是男性专家的接管使得女性对这一过程越来越疏离,从而削弱了她们在母职方面的权威和参与。^{[8] 416-434} 她认为,同样是生养孩子,在由女性自身来决定如何当母亲和由男性来为女性做决定之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父权制成功地将生物性母职制度化,让女性觉得不当母亲的女人就不是真正的女人,而好母亲应该是全心全意扑在家庭、没有自我世界的人;与此同时,母职制度还成功地阻止了女性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抚养孩子。而女性一旦夺回自己对生育和养育的控制权,就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体验母职实践,因此里奇认为决不能以解放的名义放弃母职或者指望通过纯粹的生育技术来解决问题,相反,女性解放的实质就在于重获自己身体的自主权。^{[6] 83-85}

激进女性主义者对于身体和母职的这种矛盾态度,常被诟病为他们太坚持或迷恋于将所有事情都看成是一种个人选择,而在父权制的情境下女性的选择能力恰恰是问题所在。^{[6] 87} 文化女性主义者则着力挖掘母职经验和文化本身对于女性及其社会带来的正面价值。例如萨拉·卢迪克(Sara Rud-dick)指出,尽管现实中的母职实践并不理想,充满了艰辛、不完美甚至暴力和陷阱,但是母亲并不比其他人更好或更坏,她们只是认同那些认为适合母职的品质,而母亲的职责就是保护、抚育和培养孩子。她们不是天生被赋予成为好母亲所需要的技能,而是通过深思熟虑的实践才形成了所谓“母性思维”(maternal thinking)的东西,它包含了母亲用来为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安全的养育环境的所有策略。卢迪克认为,这些被困于家庭内部的好的母职实践的社会价值,应该进一步扩展到更大的社会层面,以建设一个更加平和有爱的社会。^{[8] 416-434}

文化女性主义的这种学说被批评为带有明显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倾向,即无论出于天性还是后天养育,男人和女人从根本上就被视为不同的两类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简·埃尔斯坦(Jean Elshtain)指出,这种本质主义暗示着人是先验的存在、男性和女性角色在本性上是无法改变的,这是政治上非常有害的陷阱,必须加以摒弃。在她看来,父权制也是一个有麻烦的概念,尽管它对于那些重新思考受压迫经验的女性来说是个有用的分析工具,但是已经成为“男人压迫女人、女人服务于男人”这类千篇一律批判的生硬工具,掩盖了不同社会和女性经验的丰富多样性。^{[6] 87-90} 埃尔斯坦认为,

女性作为母亲的经验赋予其道德上的优越性,养育和照料的母职实践使得她们在家庭中养成了不同于男性的合作、关怀、同情、责任、爱与专注的品德,这种代表人类美好关系的利他型品质若延展到社会,可以形成不同于个体主义的价值体系并改变社会的基本治理规则。这个过程可称之为“社会母职实践”(social mothering),它将使男性和女性更加关注共同体的福祉和责任,而不仅仅是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可见,在埃尔斯坦的理论中性别差异并不代表着男高女低,将女性限定于家庭私人领域、男性限定于公共领域的两分法意识形态反而造就了女性更高的美德,使之成为一种赋权的力量,因而母职在这种意义上不是压迫的来源,而是重建性别平等社会的资源。但是这种学说一方面把家庭生活和母职实践过于浪漫化而被指为乌托邦,另一方面因更加强了公共和私人领域、男性和女性疆土之间的分离而同样遭到诟病。^{[8] 416-434}

二、被声讨的母职和被搁置的悖论:国内母职研究的特点和热点

国内母职研究及其相关讨论最早出现在2010年前后,比西方女性主义的母职研究整整晚了30多年。这期间作为女性主义发源地的西方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主妇模式,成为职业女性,面向职场以及所谓工作与家庭的平衡问题;而中国社会也走过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转型的初期,面临着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公私分离以及劳动力就业市场和家庭内部分工的性别化回潮趋势。此间经济与社会的不确定性风险、阶层和贫富之间的分化,以及个体化和儿童中心主义的流行,亦成为中西方社会和家庭身处的共同语境。随着城市新中产阶层和独生子女一代进入婚育模式,有关母职的讨论成为国内新旧媒体上经久不衰的话题,与此相关的诸如“老母亲”“密集母职”“全职妈妈”“丧偶式育儿”“不婚不育保平安”等互联网新词的出现,也可以看出国内大众特别是城市女性对于母职的不平与声讨。

(一)被声讨与被搁置的:完美母亲的话语批判和新母亲形象的讨论

母亲在中国的传统和流行文化中一直代表着两种符号:一是隐忍和苦难,二是无私和奉献,因此长期以来它是作为一个道德标杆出现的。母爱往往与神圣、伟大等一类赞颂的词联系在一起,并且沿

袭着一套特别的逻辑：越是苦难，就越是伟大。这套逻辑背后的假设是：母亲的成就感和认同感，来源于她对于家庭和家人的牺牲和奉献所得，也就是来自高标准的母职，而不是来自她独立于家庭之外的个体。这样一种有关母亲角色的意识形态和神话，一方面是对母亲和母职的社会价值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对作为母亲或者没有当母亲的女性的制度性压制。因此国内学界对于母职研究议题及其观点的引进，基本上是对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母职的声讨而不是歌颂开始的。例如近些年来在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期间，更多媒体开始选择与母职相关的话题讨论，或者以对母亲需求的关注和关爱为主题，而原先意义上那种对母亲及其奉献一味赞颂的模式，甚至被视为一种别有用心道德绑架而遭到唾弃；与此同时，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也塑造了独立而美丽的新一代母亲（“辣妈”）形象，这与素来以任劳任怨、默默奉献著称的老一代母亲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有关完美母亲（或者理想母亲、超级妈妈）的当代话语分析和批判，是国内母职研究的重要内容。陶艳兰的系列文章讨论了不同时期媒体或流行杂志中所呈现的理想母亲形象以及建构过程，指出中国社会正是通过母职的种种社会建构进一步强化了“母职是天性”这样一种生物决定论的观念。这种社会建构性体现为性别意识形态的隐秘呈现、职场规则的去性别化运作，以及有关生育和抚育孩子知识的科学权威论证（如对自然分娩、母乳喂养、母亲陪伴的强调）等等，它们共同形塑了“妈妈很重要”“妈妈的角色不可替代”的母职认同。^[12] 她的研究还发现，好妈妈或者理想母亲的身份建构，跟不同时代对于育儿知识以及母亲定位的不同认知有着紧密的关联。21世纪以来，媒体中的母亲角色和形象被塑造成多元化的面向，但是女性依然被认定为儿童首要且最佳的养育者，并要求全身心投入照顾孩子，以及在专业的育儿指导下让自己成为真正的育儿专家。与此同时，她们还被塑造成能够平衡工作与家庭的超级妈妈，通过高效的时间管理让自己成为能够从容应对工作和育儿双重压力的母亲。^[13]

美国女性主义者莎朗·海斯(Sharon Hays)曾将当代中产阶级面临的母职要求概括为一种“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意识形态，即主张母职实践必须是在时间和劳动上高度密集、情感上高度投入、以孩子为中心的、花费昂贵并听从专家指导的

过程。她认为这样一种母职建构将女性置于一种无法实现的目标追求，完全脱离了今日家庭所面临的现实，其结果导致许多女性筋疲力尽、士气低落，确信自己在成为一个好母亲上是个失败者。^{[11] 403-404} 这种情景跟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母职意识形态的重构非常相似，因而“密集母职”的概念无论在国内媒体还是学界都得以广泛传播和应用。如金一虹的研究发现，社会转型期高度市场化的劳动分层已经使得“工作母亲”的母亲身份受到排斥，同时消费主义带来的文化转型，又使整个观念向传统回摆，加上公共托幼系统的瓦解和育儿的私人化，今天的好妈妈已从以往的工作母亲转为能为了孩子牺牲自我发展、全心全意投入育儿的全职妈妈；并且她们不仅要承担起对孩子的照料责任，还必须成为全知全能的“教育妈妈”。^[14] 杨可将教育市场化背景下城市家庭中的这样一种母职实践新特征概括为“母职的教育经纪人化”趋势。^[15] 还有学者将重构后的母职规范概括为集“科学的妈妈”“懂得孩子的妈妈”及“超级妈妈”于一身的多面手，这种在“孩子至上主义”的文化氛围下日益精细化、专业化的育儿方式所要求的母职期待，使得怀抱好妈妈目标的女性常常陷入两难的煎熬：究竟该辞职回家当全职妈妈，还是继续扛起职业女性的双重担子？^[16]

这些研究揭示了女性作为个体的主体性与她们的母职身份在实践中的融合困境。沈逸斐关于“辣妈”的研究指出，这一新媒体形象的塑造本身内含着现代性的悖论，她们一方面被要求在外表上“美丽与孕产两不误”，另一方面还要兼顾事业和家庭，并且既要颠覆传统、“做回自己”，又要依然遵从母亲角色。这些矛盾而苛刻的要求不仅不能体现女性的自主意识，反而加大了对女性的压迫。^[17] 陶艳兰在对流行育儿杂志中的“好母亲”话语及其建构机制进行分析时也发现，近十年来备受推崇的一种独立自主的新母亲形象，声称女性有权通过选择来自掌控自己的命运，既可以选择回家做全职妈妈，又可以选择外出工作谋求个人发展，并主张好妈妈不是为了孩子一味牺牲或放弃自己的快乐和追求，而是要先达成自我满足。这种强调个人价值在先的新母职规范，表面上看是对传统的挑战和反叛，但实际上可能是受到了女性主义关于消费是自我赋权的话语影响，其结果可能使女性由受制于传统父权转向臣服于现代资本的逻辑。^[13] 也就是说，

让女性自由选择回家还是就业的流行新叙述,并不意味着女性就真正获得了自主性。

可以看出,国内母职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完美母亲话语或者“密集母职”意识形态的批判上。尽管不同时代的母职规范和理想母亲形象一直在不断变化之中,但是对于已婚已育女性来说,她们被要求永远将作为母亲的身份排在作为独立个体的身份之前,或者在这两个身份之间左右徘徊,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多大改变。而关于近年来备受追捧的“辣妈”形象或者独立自主的新母亲形象的讨论,试图将母职实践纳入女性的自主性套餐中,这就引出了一个被忽略和被搁置的经典问题,即母职的悖论。去除了西方女性主义的政治意涵,母职悖论在中国并非首先表现为平等还是差异、压迫还是赋权的争论,而是更多表现为家庭还是个体优先、孩子为中心还是女性自我追求为中心的两难抉择。

(二)性别、代际与阶层:多样化的母职体验及其实践策略

国内母职研究虽然很少涉猎政治议题,但却不乏多重视角下的母职体验、实践策略及其权力关系的探讨。就具体议题而言,西方女性主义在体现生物性母职的怀孕和生产过程以及体现社会性母职的抚育和养育实践方面都有大量的研究,而国内母职实践的相关研究则大多集中在后者。不过近年来出现的有关生物性母职实践的为数不多的研究,都关注到了女性作为个体的身份和身体的主体性问题。例如有学者指出,国内越来越专业的医疗化技术介入女性的怀孕和分娩过程,使之去自然化、“肉身化”甚至疾病化,其结果带来了女性身体的焦虑和主体性的异化,而来自女性自身的身体经验被贬低;同时,医疗话语和技术的介入还影响到了母职的建构和体验,女性通过屈从或迎合现代医疗对健康的定义完成了对于母职的想象和理解。^{[18][19]}与西方女性主义母职研究和母职运动对于分娩医疗化的抵制态度不同,国内学者着重揭示医疗化给女性身体带来的异化体验以及建构策略。如有学者发现,正是当母亲的责任迫使孕产妇在自然的身体经验和医疗话语的强势介入之间进行权衡并最终与之和解,同时通过调和传统、家庭与医疗技术之间的关系形成自身对母职的理解。因此生育过程中的女性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医疗化的控制,相反,她们在作为妻子、母亲和病人的不同身体和身份的策略性转换之间共同参与了母职的建构。^[19]

近年来网上还流行一种有关社会性母职实践的极具中国特色的叙述,就是所谓“丧偶式育儿”“爸爸去哪儿了”的吐槽。有学者针对媒体中的相关讨论文本进行了分析,发现丧偶式育儿并不仅仅是个育儿或者母职话题,而是“集育儿与婚姻生活于一体的批判话语”。它不仅蕴含着精细化育儿、育儿责任内卷化的母职困境,还通过滥用专家话语、建构“不完整的母职”的方式夸大了父亲缺席对儿童身心发展的消极作用,从而形成“性别化的问题归咎”逻辑,造成进一步矮化女性气质,加剧了女性的性别焦虑。^[20]也有学者将这一现象放在儿童照顾的性别化框架里来分析,并探讨造成母职困境背后的社会机制问题,从而引出推动儿童照顾责任重新分配的“性别正义”的社会政策变革思路。^[21]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私人领域的母职问题扩展到社会公共领域的框架下来讨论,探讨国家话语、专家话语、消费话语等公共力量对于性别和家庭的塑造给母职实践带来的影响。性别视角的相关研究还包括已婚已育女性在劳动力就业市场所遭遇的“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22]、“性别—母职双重赋税”^[23]等主题,这些引入经济学视角的母职研究最为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出发点不是将母亲作为一种家庭照料者身份,而是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个体身份来探讨。

中国城乡家庭的全职主妇在21世纪以来尽管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但是夫妻共同外出工作依然是最为普遍的模式,而这种模式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大多数家庭由上一代老人帮忙照看隔代的孙子女,为支撑年轻父母特别是年轻妈妈不因怀孕生育而中断职业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中国甚至整个华人社会的母职研究若仅仅套用女性主义的“密集母职”之说,是不足以充分解释的。事实上国内有关跨代共同育儿、隔代照料、“老漂族”等等的相关研究都已多多少少关注到这一点,只不过专门从母职角度延伸讨论的不多。有学者引进了女性主义的“扩展母职”(extensive motherhood)和“集体养育”(collective mothering)的概念,即女性作为母亲不必亲力亲为或者只需部分参与母职工作,而把其中的大部分工作委托给亲属或者他人来集体完成的母职实践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母亲的女性承担的是孩子养育的全局掌控者或者规划者角色,而帮忙照料的老人或者月嫂/育儿嫂,抑或是几方的共同合作才构成了完整的母职实践。^[24]也有学者将

之概括为中国特色的“全家人母职”或者“团队母职”实践,即为了达到育儿和工作的平衡状态,依靠家人和父母亲属的团队协作和轮换来完成母职工作,并认为这种普遍采用的策略一方面逾越了传统母职规范,另一方面也可视为结构性制约下女性作为一种行动主体的能动性反应。^[12]

然而这种中国特色的母职代际转移或者“全家总动员”的团队协作模式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有学者将那些为了照顾孙子女而流动到子女所在城市的“老漂”母亲生活概括为“劳累、拉扯与孤单的状态”,指出她们日常承担着双重的母职照料责任:对子女的照料和对孙辈的照料,需要付出极大的体力和精力,承受着身体的超负荷劳累;同时她们还面临着育儿文化代际转变带来的挑战,尤其是来自农村的“老漂”母亲与城市中产阶层的子女家庭之间在照料经验和育儿观念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和拉扯;此外,照料者社会交往的受限和匮乏,以及未来与子女和孙辈因地域分离可能导致的情感联结减弱也使她们感到孤单与焦虑。^[25]也有一些学者考察了这种跨代合作育儿的模式下代际的权力冲突以及应对策略,例如肖索未的研究发现,城市家庭的代际合作育儿通常形成了“严母慈祖”的分工模式和权力格局,其中母亲成为育儿总管,以科学育儿为指导对孩子成长进行总体规划,掌握着主导话语权 and 决策权;而祖辈则以帮忙者的角色承担儿童生理性抚育和家庭照料工作,但在家庭事务决策和话语权上处在边缘位置。这种以年轻母亲为权力中心、祖辈处于边缘位置的非制度化的家庭权力关系格局,是城市家庭通过代际互助来应对育儿责任私人化和市场化的一种富于弹性的家庭策略。^[26]

跟西方女性主义一样,国内的母职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城市中产家庭,而母职本身在城乡、阶层和地域文化等差异下的多样化实践,尚未得到充分地呈现。陈蒙关于城市中产阶层女性理想母职叙事的研究明确引入了阶层视角,认为这一阶层母亲心目中的个人理想生活状态与家庭、社会塑造的全能妈妈的母职期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她们渴望达到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平衡,但在现实中却不易实现,进而在实践中生成了一种新的母职策略,她将之概括为“知识与情感密集”的母职意识形态,即母亲不再事无巨细地亲力亲为孩子的日常起居,而是主要承担以陪伴和教育为主的母职责任,当然其实现条件必须依赖于祖辈或者雇佣照料的资源。^[24]

但是对于进城务工女性来说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们的母职实践呈现出全然不同于中产阶层母职的复杂样貌。有研究发现,这些来自乡村的女性年纪轻轻就远离家乡到城市打工,但在结婚生育后为了照顾孩子会尽可能进行工作调整,形成“养娃又养家”的“陀螺模式”,受到家内与家外双重劳动的挤压;同时身为妻子的她们还要在流动中尽力维持家庭的完整性。在养育孩子方面,她们往往跟城市家庭一样践行“精养模式”,坚持把孩子留在身边照顾和教育,但又受到多重结构性条件的制约。因此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实践融合了“做工人”“做妻子”“做家长”这三重角色之苦以及多层次、多系统的困境。^[27]

上述来自性别、代际、阶层等不同视角的母职经验的研究梳理,展现了21世纪以来国内家庭和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女性多样化的母职体验以及实践策略。许多概念、观点和思路明显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母职研究的影响,但同时也显示了中国很多独有的议题以及复杂性。然而无论议题和观点如何转换,都未能逃脱母职的悖论。所不同的是,国内关于挣脱这一悖论的努力和策略,仍大多放在家庭这个私人框架下讨论,因而让母职走出私人化议题、回归社会公共性才是核心要义。

三、结论与讨论:国内母职研究中的未解之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母职在世界范围内都已成为顶流议题,原因在于它体现了社会变迁背景下性别、阶层、族群等多种结构性因素的交叉点,同时也是个体与家庭、制度与文化、国家与市场、公共与私人等多层次力量和关系汇集与形塑的结果。从西方女性主义的演变脉络来看,与女性研究同期兴起的母职研究经历了从母职到母职实践、从批判到重塑的过程,母职的概念本身也逐步分解为作为制度或意识形态的母职、作为经验或角色的母职、作为认同或主体性的母职这三个彼此关联的维度。早期的母职研究多以批判对母职意识形态的迷思为主,后来更多转向对母职经验的分享和赋权的肯定。这种转向本身并未能逃脱母职的经典悖论——给女性带来压迫性体验的母职本身,恰恰也是女性获得自我认同和解放的力量,这从根本上源自女性作为母亲与作为独立的人之间的两难。也就是说,母职从一开始就内含着张力,有关压迫还是赋权的争议在

不同流派和阶层的母职研究中被不断放大,也体现了母职实践的多样性和变动性。

国内母职议题和研究的流行比西方女性主义晚了30多年,大量以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为蓝本的概念和观点的引入,如关于完美母亲或者超级妈妈的讨论、有关“密集母职”意识形态的批判、关于专家话语和医疗技术的霸权对于女性身体的异化和母职的再造,以及对“辣妈”等消费主义女权形象的警惕等等,都为理解中国当下年轻一代城市中产阶级女性的母职困境带来启示。除此之外,基于性别、代际、阶层等不同视角的母职经验分享也呈现了许多中国独有的议题、困惑以及实践策略,包括“丧偶式育儿”的讨论、“老漂”等跨代合作育儿模式的研究,以及进城务工女性“养娃又养家”的多重流动母职等等。这些考察和分析展现了中国式母职实践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策略性,以及伴随女性终身的作为母亲身份与独立自主的个体身份之间的两难。因此母职悖论在国内学界并不以压迫还是解放的政治议题出现,而是更多放在家庭还是个体优先、孩子为中心还是女性自我追求为中心的框架下作为私人选择的议题出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近年来网络上有关“全职太太”“全职妈妈”相关讨论的公共性价值。

因此以高起点、真问题出现的国内母职研究,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还有一些未解之题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深入挖掘。

其一是母职本身内涵的多样性和边界的流动性探讨。例如已有研究对母职的关注仅限于女性身份以及对男性缺席的声讨,但是在许多新一代的城市家庭甚至农民工流动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规范已经得到部分修正,除全职主妇家庭之外,一般双职工家庭中越来越多的男性也开始参与到育儿照料中,所谓“理想父职”的要求已不仅仅满足于挣钱养家,还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到孩子的照料和陪伴中去,缺席孩子成长历程的父亲被认为是不称职的父亲。^[28]这种新的工作—家庭平衡模式下,父职和母职是如何分工协作的?那些回归家庭全职当“奶爸”的父职跟“全职妈妈”情境下的母职又有什么区别?如果作为母职制度批判基础的性别角色发生了倒转,那么原有的母职理论还能成立吗?该如何解释“男性母职”这种看起来矛盾的词汇,作为男性的他们又是如何协调自身与男性气质之间的冲突、建立起对母职的身份认同的?如此这

般的新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此外,已有研究将母亲主要划分为生物性(生育)母亲和社会性(养育)母亲两种常常统一的角色类型,但是随着冻卵、试管婴儿等现代生殖技术的突破以及捐卵、代孕等地下市场和灰色产业链的形成,母亲的含义变得复杂而迷惑,除了作为生育者和养育者的母亲之外,还出现了“基因母亲”“代孕母亲”的概念和彼此分离的角色,这些新的母亲类型无论在生物学、伦理学还是社会学意义上都刷新了既有母职和亲子关系的边界,这些现象的研究以及有关是否合法化或者有限开放的争论,将不可避免地触及母职研究中关于生育不平等、身体的自主性和工具化,以及阶层和性别对家庭的交叉重构等经典问题。因而推进而不是回避相关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并拓展对母职、家庭等概念和关系的全新理解,还将为未来相应制度法规的制定提供依据。

其二是有关母职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探讨。母职的悖论表明,在私人框架下将母职作为一种个人自主选择的困境来讨论,难免走入无解的死胡同。即使那些表面上自认为独立自主的母亲,把自己视为可以通过“向前一步”的努力自由游走于“全职妈妈”和职业女性之间,将无限的母职实践纳入女性选择中有限的自主性套餐,如果脱离了社会结构性制约及其破解方式的考量,仅凭个体意义上的左右逢源,终将难以走出“超级妈妈”的魔咒而陷入两难。因此要让母职走出私人化议题,成为公共议题和社会政策关注的一部分,需要将家庭这个私领域与宏大的社会议题关联起来,而不是从家庭自身寻求消化社会问题的出口。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中,“内卷”一词经由学者和媒体的各种解读和传播,第一次从学术界破圈成为网络大众话语,疏解了很多人在疫情下的压抑岁月里对于风险感知的焦虑。其中人类学家项飏接受澎湃专访有关内卷的对话中,首次谈到了关于“母职的内卷化”问题,即在孩子教育上投入的无限增加,但结果却不可知而又停不下来,进而走入一个死胡同的过程。他认为当今的内卷可以理解为一个高度消耗精力的、“陀螺似的死循环”,是一个非常耗能的陷阱,其背后是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所导致的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机制。^[29]这一关于母职内卷的阐释,并未涉及性别以及母职身份本身,所以严格地说只能算教育内卷化的解释,其更关乎的是社会变迁背景下阶层的上下浮动带给普通人的焦虑。如若延伸到其他的母职实

践中,比如生育和抚育照料等等,则问题的核心也可理解为母职本身是否构成一种高度一体化的性别竞争市场,以及是否存在退出机制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内卷化的讨论对于理解中国当下女性的母职和婚育困境,依然是富于启发性的。

但是正如不能将教育内卷化的责任归咎于母职的内卷化,同样也不能将母职焦虑和困境的根源归之于女性个体选择和家庭策略的明智与否,因为母职的悖论深藏于社会结构和制度体系当中。如若将生育和养育视为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那么作为生育者和养育者角色的母职实践就不再是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属性,而是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再生产的组成部分,这就是21世纪以来西方女性主义中获得空前发展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所强调的。依据这一理论,家庭场域中各类不平等的根源恰恰在于再生产劳动的私人化以及与生产性劳动相比被挤压的屈从地位,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打破公私边界来提升社会再生产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30] 如此

一来,母职的困境就可以解释为女性和家庭以私人化的方式背负起了公共的社会再生产责任,因此母职的悖论来自所谓“生产与生活体制”的公私分离以及公共照料的缺席所导致的社会再生产危机。这一过程伴随着再生产领域的商品化和异化,折射出了母职背后深层的性别焦虑和阶级焦虑。其挣脱之路只能寄希望于让母职回归公共生活和社会政策的前台,即通过制度变革寻求生产与生活再融合的可能。这一理论又被称为女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31],它试图走出原子化、碎片化的精英主义性别分析逻辑,让性别问题重返结构性的政治经济学。然而在育儿方式日益精致化和专业化的今天,生育和养育的母职实践本身何以能够超越私人化?它将给家庭这种组织模式和亲密关系带来怎样的冲击,又会带来哪些意料之外的后果?市场化的母职“外包”与社会公共照料体系的多元并行与合作何以可能,最终能否突破社会整体意义上的照料的女性化问题?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于未来更多有价值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O'Reilly, Andrea. Encyclopedia of Motherhood[M]. LA: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10.
- [2] 潘淑满. 台湾女性的母职图像[A]. 王金玲,黄长玲. 性别视角:婚姻与家庭[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 [3] 俞彦娟. 女性主义对母亲角色研究的影响:以美国妇女史为例[A]. 王金玲,黄长玲. 性别视角:婚姻与家庭[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 [4] Rich, Adrienne.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86.
- [5] Bernard, Jessie. The Future of Motherhood[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Inc, 1975.
- [6] Tong, Rosemarie Putnam. Feminist Thought: A More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8.
- [7] Chodorow, Nancy & Contratto, Susan. The Fantasy of the Perfect Mother[A]. Barrie Thorne with Marilyn Yalom. Rethinking the Family: Some Feminist Questions[M]. Bo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2.
- [8] Budig, Michelle. Feminism and the Family[A]. Jacqueline Scott, Judith Treas, and Martin Richar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Sociology of Families[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
- [9] Allen, Ann Taylor. Feminism and Motherhood in Western Europe, 1890—1970: the Maternal Dilemma[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10] Collins, Patricia Hill.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11] Oakley Ann. Woman's Work: The Housewife, Past and Present[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4.
- [12] 陶艳兰. 世上只有妈妈好——当代城市女性的母职认同与实践[J]. 妇女研究论丛, 2013 (6).
- [13] 陶艳兰. 塑造理想母亲:变迁社会中育儿知识的建构[J]. 妇女研究论丛, 2016 (5).
- [14] 金一虹. 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工作母亲[J]. 学海, 2013 (2).
- [15] 杨可. 母职的经纪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J]. 妇女研究论丛, 2018 (2).
- [16] 郑杨. 社会变迁中的育儿模式变化与“母职”重构——对微信育儿群的观察[J]. 贵州社会科学, 2019 (7).
- [17] 沈逸斐. 辣妈:个性化进程中母职与女权[J]. 南京社会科学, 2014 (2).
- [18] 林晓珊. 母职的想象:城市女性的产前检查、身体经验与主体性[J]. 社会, 2011 (5).
- [19] 李琰白. 生育事件中女性的身体经验与具身实践:基于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调研[J]. 社会, 2020 (6).
- [20] 郭戈. “丧偶式育儿”话语中的母职困境与性别焦虑[J]. 北京社会科学, 2019 (10).
- [21] 徐依婷. “丧偶式育儿”城市新生代母亲的母职困境及形成机制[J]. 宁夏社会科学, 2020 (6).

- [22] 申超. 扩大的不平等:母职惩罚的演变(1989—2015)[J]. 社会 2020 (6).
- [23] 杨菊华. “性别—母职双重赋税”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J]. 人口研究 2019 (1).
- [24] 陈蒙. 城市中产阶级女性的理想母职叙事——一项基于上海家庭的质性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2018 (2).
- [25] 卜娜娜,卫小将. 劳累、拉扯与孤单:“老漂”母亲的母职实践及回应[J]. 妇女研究论丛 2020 (6).
- [26] 肖索未. “严母慈祖”: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14 (6).
- [27] 赵洪萍. 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实践:以“家为社会田野”的叙事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2020 (5).
- [28] 张品,林晓珊. 陪伴的魔咒:城市青年父母的家庭生活、工作压力与育儿焦虑[J]. 中国青年研究 2020 (4).
- [29] 王芊霓. 人类学家项飏谈内卷: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EB/OL]. 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648585 2020-10-22.
- [30] 李洁. 重新发现“再生产”:从劳动到社会理论[J]. 社会学研究 2021 (1).
- [31] 董一格. 生活即劳作: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劳动问题[EB/OL]. 人民食物主权论坛讲座 <http://www.shiwuzq.com/portal.php?mod=view&aid=2377> 2020-09-14.

责任编辑:董力婕

The Paradox of Motherhood: From Critiques of Feminism to Chinese Mothering Strategies

WU Xiaoying

Abstract: Motherhood has become a popular topic worldwide over the past decades.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route of Western feminism, motherhood studies has experienced a shift from motherhood to mothering and from criticism to reconstruction. The term itself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interconnected dimensions of inquiry: motherhood as institutio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motherhood as identity. The controversy over oppression or empowerment constitutes the classic paradox of motherhood, which also reflects the diversity and variability of mothering. Influenced by feminism, most domestic research on motherhood focuses on criticism of the discourse on perfect mother and analysis on the maternal dilemma of middle-class women. Meantime, the sharing of mothering experiences based o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uch as gender, generation and class also presents many unique subjects, difficultie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in China. Nevertheless, the paradox of motherhood does not appear as a political issue in the Chinese academia but as a dilemma of family first or individual first, child-centered or self-fulfilling as a woman. The discussion as such under the private frame has manifest limitations, and the core essence to free mothering from the paradox is to bring it out of the private field and back to the public sphere. For this, there still need further explorations on the questions unsolved in motherhood studies of China.

Key words: motherhood; mothering; feminism; paradox